

时代热题

## 日本侵略者是怎样炼成的？

袁伟时\*

甲午战争以后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独立的主要威胁来自日本和俄国（包括沙俄和苏俄）。

东北是三个国家——中国和俄国、日本两个侵略者三方的博弈场。

什么是帝国主义？简单说来，它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侵犯另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掠夺其领土和资源，乃至奴役其国民。它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列宁主义宣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有三个特点：（1）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定义难于自圆其说。人们看到的历史画面是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侵占别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一再入侵邻国，经济停滞不前，政治上专制独裁、践踏法治，直至坍塌。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引领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则成了落后国家摆脱困境的康庄大道。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曾四出侵略别国，但也有维护国际和平、支持正义和民族独立的大量记录。

人类是在文明与野蛮博弈中逐步发展的。文明说到底是人类认识社会和自然中积累下来的规则。从野蛮人逐步变成文明人，不外是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规则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过程。这些规则正确与谬误并陈，在永无止息的试错过程中迂回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这样一个共同体，它的对外政策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侵略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对外侵略或和平合作，是各国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可能面临的选项。不要盲目地讲中国一向爱好和平。中国或者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发动战争对外侵略的历史。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1868—1945）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1868 年开始维新的日本，只用了 26 年，便成为征服朝鲜、入侵中国的侵略者。进入 20 世纪以后，更急于称霸东亚，成为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祸首。

这是多种因素汇合的恶果，说到底思想和制度互动的产物。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思想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思想经历漫长的缠斗：一方面，认真考察西方的各种制度，推动地方从封建制转化为现代的地方自治制度，在全国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另一方面，1875 年颁布《谗谤律》《新闻纸条例》，压制言论，先后颁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灌输忠节、忠孝等臣民道德，钳制军人和青少年的思想；1889 更制订出一部“主权在君”的不伦不类的宪法；从而构建出一个半现代、半野蛮的军国主义国家。

具体说来，是以下四个决定性因素，把明治维新引向对外侵略的邪恶道路：

### 一、恶性民族主义大膨胀

日本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自称倭或大和。公元 57 年（东汉光武年间），倭奴国王向东汉派遣使节，光武帝赐予“汉委奴国王”金印（1784 年这个金印被发现），成为两国交往的确切证据。不过，那时的日本仍分裂为许多小国。什么时间统一的？现今辽宁集安县通沟保留了一块公元 414 年建造的石碑——高句丽广开土王功绩纪念碑，又称“好大王碑”，记载了从公元 391 年开始，十多年间倭国入侵朝鲜半岛，占领半岛本土国家百济、新罗等国，最终被高句丽驱逐出半岛的经过。这块石碑确认了两个历史事实：1. 各国边疆交错和多变，现今辽宁是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但最少其中一大部分一千多年前曾是高句丽王国的一部分。2. 中国东晋年间，日本已统一或大部统一，因而有可能派大军入侵朝鲜半岛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一个历史常识：朝鲜族最早的国家是公元前 37 年建立的高句丽，而在公元前 108

\*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

年，汉武帝已把辽东和朝鲜地区收入版图，设置了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个郡，玄菟郡下有个高句丽县；比这更早的则有殷商遗民箕子和燕人卫满在这些地方先后建立的政权，史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它们是周天子、汉皇帝的朝贡国。“西汉末期中国的统治力量一度松弛，于是在中国行政区域内最早出现了半独立的土著部落，其逐渐发展为后来的高句丽国，时间当在王莽时期。”<sup>1</sup>“好大王碑”是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与世界许多地区一样，东亚的民族和领土关系非常复杂，变动不居；歪曲历史全面状况甚至伪造历史为恶性民族主义张目，是愚不可及的蠢行；如果以此为侵略藉口，则是居心险恶的罪行了。

以中国典籍《隋书》有确切记载的为例，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日本曾四次派出遣隋使到中国。607年小野妹子递交的其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表达了日本与中国平等相处，不是藩属的态度。“追根溯源，‘日本’这个国号是702年日本恢复派遣自669年以来长期陷入中断的遣唐使（朝贡使）时，不再自称‘倭’而使用‘日本’这一说法后确立的。……尽管日本与唐朝的关系实际上并非对等，但天皇和他的官员却一直以‘唐为邻、新罗（朝鲜）为藩’这样的对外意识为前提进行统治。不仅如此，日本长期向唐朝派遣朝贡使（遣唐使），却不愿进入唐朝的册封体制”。<sup>2</sup>这与其他东亚国家以接受中国册封为王权合法性依据极为不同。其实，新罗不是日本的藩属，没有向它朝贡。日本国内大小诸侯林立，天皇需要通过虚构日本历史和“唐为邻、新罗为藩”的幻境，威慑众多小诸侯。

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历史也是统一和分裂交替出现的。16世纪出现了一个重大历史节点。雄才大略、屡立战功的丰臣秀吉（1536—1598），1583年用巨石筑大阪城（至今仍是大阪的重要旅游景点），1585年以赫赫武功出任总揽政务的“关白”，然后统帅25万大军，南征北战，征服60余国，终于在1590年统一全国。

与前人一样，统一全国后，他便蓄意对外扩张。他对明帝国、朝鲜各国政府和菲律宾总督发出国书，要他们称臣进贡，并计划占领朝鲜；占领中国，以北京为日本首都，迎接天皇进驻；然后进攻天竺，分封给各将领。第一步攻朝，目的是“入唐”。他在致朝鲜国王书中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sup>3</sup>作为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开端，他于1592年（明万历20年）指挥15万8700大军，加上9200名水手组成的海军，10万后备兵力，兵分九路，侵入朝鲜，20天便占领了汉城，不久占领了平壤。明帝国出兵援朝，日军被赶回汉城。这次战争缠斗七年，日军一无所获，直至1598年丰臣秀吉逝世，不得不撤回回国。

一代枭雄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言行，不是他突发的奇想，而是日本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孽果。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是《日本书纪》和《古事记》，都成书于8世纪，“两书中所载有关国家建立的情况，不是神话，就是传说。”<sup>4</sup>多年来，日本人深信两个神话：1.日本是天赐的“神国”，是高踞万国之上的“皇国”，它是“华夏”，负有统帅和教化各方“蛮夷”的责任。2.天皇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的太阳神的后裔。时至1910年，两度出任日本首相（1898年6月—11月、1914年4月—1916年10月）的日本元老大隈重信仍信誓旦旦：“盖日本肇国之际统以神而成其治者也。故至今田夫村妇，皆有一种信念，谓统治大权在神之子孙。”<sup>5</sup>

值得注意的是，向外扩张的思想在日本知识精英中不绝如缕。

日本是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的。在感受列强欺凌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在腐败的韩国和大清帝国身上得到补偿。1855年在朝野精英中有重大影响的长州藩士吉田松阴便提

<sup>1</sup> [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6页。

<sup>2</sup>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第19页。

<sup>3</sup> 转引自戴季陶：《日本论》，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54—55页。

<sup>4</sup>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

<sup>5</sup> [日]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序论，第2页。

出：“我与美俄的媾和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守信义，乘机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sup>1</sup>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是吉田松阴的义弟，出身长州藩武士的政治家和尊王攘夷、征讨幕府的重要领导人，维新纲领《五条誓文》起草者之一。1868年12月14日，他便提出“征韩论”，说朝鲜是“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具体措施是：“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理。彼若不服，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他的主张被采纳，派了使节到朝鲜，但受到冷遇，没有达到目的。接着，征韩优先还是治内优先在政府内引起激烈争论；征韩派失势，坚决支持征韩的另一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辞职回乡，埋下后来他领导征韩派叛乱——西南战争的导火索。但他们分歧的焦点仅是时机是否成熟，何时付诸实施。1894年—1905年甲午战争特别是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力膨胀，领导者的头脑也随之膨胀，把朝鲜变为殖民地，进而占据满蒙，逐步把它们变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建立“大陆国家日本”便被确立为国策。

不但执政者满脑子对外扩张的思想，民间也广泛认同这一主张。

任何国家由前现代转变为现代国家，都必须以思想启蒙为先导，确立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思潮的主导地位，推动国民由臣民向现代公民转化，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然而，不幸的是，日本的启蒙运动兴起不久就受到严厉打压和被扭曲。

1873年（明治六年）7月，从美国回国的外交官森有礼，与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等学者组织旨在启蒙的学术团体明六社，以创办《明六杂志》（1874年3月至1875年11月）和举办演讲会等方式，宣扬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思想。1875年6月政府颁布《谗谤律》和《新闻纸条例》，开始全面压制言论，同年11月，《明六杂志》被迫停刊；不久后明六社也被迫解散。在明治维新最初的八年间，以民六社为中心，日本的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社会改革。可是，由于统治者的压制，加上这些思想家们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不深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和没有剔清传统思想的胎记，从而使这场运动既不彻底又很驳杂。

以福泽谕吉（1834—1901）为例，他是日本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领袖。他的著作《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风靡全国。他高呼“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sup>2</sup>激励人们争取平等、自由。他主张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文明开化。不过，他视朝鲜、中国为半开化国家，鼓吹侵略、占领这些国家。1882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直到1901年1月逝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为该报撰文近千篇，其中40多篇鼓吹侵略中国，包括占领满洲，把日本国旗插到北京城。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说：“日清之战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文明开化、谋求进步之国，与阻碍进步之国的战争。”宣扬侵略有理！

## 二、灌输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恶果

任何政权都需要武力支撑；日本原有的合法武装是幕府的军队和各藩的藩兵和武士。支持维新的各藩与不甘心“版籍奉还”的藩主或利益受损的武士剧烈争斗。伴随明治维新一系列和平改革的，是1877年西南战争达到顶点的十多年此起彼伏的大小战争。依靠长州藩、萨摩藩支持，中央政府剿平了些些叛乱。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有远见的将领，深感要完成维新大业，就必须抛弃分裂和落后的藩兵，建立中央政府直接统帅的军队。明治维新开始不久，1869年6月山县有朋等人前往欧洲各国和美国详细考察军事制度和兵器；回国后着手按照外国军制，陆军聘请德国教官，海军聘请英国教官，购买欧洲各国军械，编练新军。第一步

<sup>1</sup>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23页。

<sup>2</sup>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4、6页。

办军校。在办相当于高中的士官学校的基础上，招收优秀的士官学校毕业生（约占这些毕业生的20%），分别办了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培养军队将领。后来且形成了非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能提升少将以上职务的惯例，直至1936年才废除。（陆军大学从1883年4月开办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的62年间，办了60期，培养了3016名毕业生。）可是，这些军官毕业后成为朝思暮想侵略别国的战争机器，成了摧毁本国本已残缺的民主政体，把国家推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动力。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这样的畸形儿？尽管他们学的是现代军事科学和现代军事装备，但脑子被灌满了前现代的传统思想，加上他们主动吸取极端思潮，于是一批批不懂现代政治和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为何物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出台了。

传统的作用是复杂的。

比较发达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大众文化（风俗、习惯、饮食、节日、传说、宗教信仰等等）、精英文化（文字、经典等等），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

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则大同小异。自然经济大体建构专制制度；市场经济则呼唤自由、民主；而法治因素的强弱，又直接影响政治制度的形态。由于历史积淀的差异，西欧、北美，传统是争自由的旗帜；而在专制的东方，传统却是走向自由的绊脚石。后者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现象：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喜爱拿传统说事。革新者从传统中寻找国会、选举等民主制度的影子；保守者则召唤传统中据说不能移易的神圣原则，抵御一些领域的现代化，力图把自由、民主思想拒于国门之外，把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扭曲为国别或地域之争。“国学”，儒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情特殊论，是后者中影响最大的。作为率先冀图晋升于现代、富强行列的东方国家，日本是呈现这些奇特的现象最早的国家之一。

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朝野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或“和魂洋才”，另一是优胜劣汰，必须“富国强兵”。用吉田松阴的话来说是：“保存神州之本体，采用万国之器械；讲究汉土圣贤书，用于吾国忠孝行。”<sup>1</sup>应该提醒中国读者，他说的神州指的是日本。所谓“保存神州之本体”，实质是在现代化思潮强劲袭击下，力图召唤各种传统思想——“国学”“神道”“武士道”特别是儒学，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统治者随意驱使的工具。

前人的研究表明，日本有些所谓古已有之的传统，是18、19世纪才被制造出来的。日本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儒学。19世纪末率先在美欧介绍“武士道”的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1862—1933）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孔孟的书是青少年的主要教科书，是成年人之间讨论问题的最高权威。”<sup>2</sup>“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sup>2</sup>而明治维新后，统治者仍然竭力利用儒学。日本儒学当然有自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与武士道融合。“武士道就是对死的狂热。”“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发誓“应为主公所用。”“以主人为第一。”<sup>3</sup>忠于天皇、忠于主人的“死狂”武士道，是推动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重要因素。

武士道也不是一无是处。日本为什么能成为半现代化的强国？福泽谕吉认为原因之一是各藩有志之士“为我国武士道精神熏陶，其活泼聪颖、磊落不拘，几乎成为天性……从儒学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到后来治国这一阶段，既已看透锁国攘夷实属愚昧无知，于是下定决心主张开国。”

<sup>1</sup> [日]吉田松阴：《武教全书讲录》，转引自《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7页。

<sup>2</sup>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页。

<sup>3</sup> [日]山本常朝：《叶隐闻书》卷一，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44、1、2页。

“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无知所赐。”<sup>1</sup>换句话说，就是对儒学无知，不受它的羁绊，造就了维新事业！从制度层面看，日本没有移植中国的科举制度，儒学经典不是知识阶层上升必备的敲门砖，从而可以不受它的桎梏。

无论在中国或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在前现代的农耕经济时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曾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它所建构的忠君、等级、恭顺、服从的道德规范和制度秩序，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现代观念和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可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渴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却往往对观念和制度的彻底现代化深感恐惧，特别不愿意国民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竭力把青少年和军人塑造成和往日一样忠君谄上的臣民。儒学和其他旧思想就成了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就是儒家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法制化。

山县有朋（1838—1922）是吉田松阴的学生、维新元老之一，日本陆军之父，陆军大将、元帅，两次出任首相。他坚持继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1878年，他写就《军人训诫》，又发起制订《军人敕谕》（由哲学家西周执笔），1882年1月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主要内容如下：

“我国军队世为天皇所亲御……兵马大权，由朕亲统，所司之事委诸臣下，然其大纲仍归朕总揽，不可委之于臣下。……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朕之深望于汝辈军人也如斯，故犹有训谕五条述之如左：一、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惟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慎勿丧失节操，而徒受无耻之污名可也。二、军人须以礼仪为重。……须知下级者之承上命，实无异承朕命。……三、军人当尚武勇。……四、军人当以信义为重。……古者尝有守小节之信义，而大纲之顺逆，或惑于公道之是非者，此殊不可。英雄豪杰，每因重私情之信义，而遭杀身之祸，以致遗臭万年者，亦复不少，可不戒哉？五、军人应以质素为旨。盖不尚质素，则必流于文弱与轻薄，徒尚奢侈，则必陷于贪污与无耻，遂至志气为之消沉，节操为之丧失，武勇亦为之化为乌有，而为世人所不齿……以上五条为军人不可须臾忽者也，必须诚心实行。盖此五条，即为吾辈军人之精神，而诚心又为此五条之精神。苟不诚心，虽嘉言善行，亦为欺人之虚伪，心诚乃可成其事耳。……愿汝辈军人善体朕意，谨守此道，以尽报国之忠。……”

贯彻始终的是诚心诚意，惟天皇和上级的马首是瞻。心不诚，这五条就落空了。

1889年12月至1891年5月，山县有朋第一次出任内阁首相，便指定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教育敕语》，于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全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焉。斯道实为我皇祖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遵守。通于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者也。朕庶几与尔臣民共同拳拳服膺，咸一其德。”<sup>2</sup>

这个敕语是日本青少年和举国国民思想教育的纲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支柱。以儒家忠孝思想为基础，归结于培养“忠良臣民”，为天皇之命是从。秉承这个敕语，“文部省于1937年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为《国体的本义》。该文件劝说日本人‘舍弃’他们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原。此外，有着纯洁精神的日本人优于任何其他民族，且‘秉性与西方国家所谓公民迥然相异’。”<sup>3</sup>

<sup>1</sup> 《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3、294页。

<sup>2</sup>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再检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2页。

<sup>3</sup> [荷]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顺便说说，山县有朋炮制的这一套不但贻害日本，也流毒中国。蒋介石的最后学历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肄业，《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烂熟于心。于是，他在“力行哲学”的旗号下，提倡学王阳明，提倡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提倡所谓心一定要诚，一定要力行；说得明白一点，我是领袖，你们要忠于我，诚心诚意听我的，埋头“力行”！孙中山也玩这一套。他说我是先知先觉，党的干部是后知后觉，老百姓是不知不觉，都听我的就行了！总之，要服从，要诚心诚意服从，信仰王阳明那一套，天下就太平了！

### 三、有宪法，没宪政；权力失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是伊藤博文主持下制订的。1886年在两位德国顾问参加下开始起草。1887年4月德国顾问罗斯勒（Hermann Roesler）提出草案，井上毅据此提出两个方案，然后由伊藤博文与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反复讨论、修改，制订《日本宪法修正案》于1888年4月呈报天皇。根据伊藤的提议，天皇网罗各方人士于4月28日成立了枢密院（后改称贵族院），负责审议宪法。伊藤为此辞去首相职务，改任枢密院长。也就是说，这部宪法起草、审议均由伊藤博文一手操办的。从程序说，这部宪法是奇特的。从内容看，这部宪法有四个鲜明特点：

1. 这部宪法脱胎于德国宪法。日本宪法共76条，其中46条抄自1871年4月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那时的德国仍是专制帝国。

2. 开宗明义说“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总揽统治权。”把宣战、媾和、缔约、戒严的大权都归诸天皇，俨然专制君主。按照伊藤博文的解释，“宪法之意义在于：揭示我皇大权，将其明记条章，”“天皇居于统治之大位，统领大权治理国土臣民……所谓‘治理’者，即统治之意也。”<sup>1</sup>明确否定了主权在民这个现代宪法的第一原则。

3. 否定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议会的立法权处处受限，天皇非常容易找到藉口“可发布代替法律的敕令”“可自行发布或令政府发表必要之命令”。<sup>2</sup>它承认臣民有选举、被选举、请愿、示威、通信秘密、言论自由等权利，但处处预设“依法”限制的前提。“一切都是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下容许些许人民参政而已。而且允许参政的人民，只限是26岁以上的男子中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明治23年（1890）第一次总选举时，有这种权利的人，其实际数字为450365人，只占总人口的1.24%。”<sup>3</sup>

后来，选举制度逐步有所改善；1927年、1930年、1932年且曾三次举行普选。但是，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投降，日本政治运作始终没有实现现代化。公民的选票不是决定政府领导人去留的决定性因素；元老和军人的魔影——他们在幕后的计算和交易，一直在牵扯着他们。

4. 巩固维新以来废除封建制的成果，完善了地方自治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保障私有权和契约自由，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简单地说，它在东方社会建构了一个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

5. 军部直属天皇，军队统帅权独立于内阁，日本是“皇国”，军队是“皇军”，不是国家军队。

这个制度也是从德国学来的。确立这个制度后，后果就严重了。陆军大学的教科书《统帅参考》（机密文献）说：“统帅权的本质是力，具有可以超越法律的作用。”“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对议会不负任何责任。”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研究者得出结论：“统帅权的独立，可以说是我们在探究先前发生的大战中造成‘陆军鲁莽从事’的真正要因的关键词。”<sup>4</sup>

<sup>1</sup> [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sup>2</sup> 同上，第7、9页。

<sup>3</sup>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sup>4</sup> 《検証戦争責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于是，日本不但没有像欧美民主国家那样建立军人不得干政的制度，而且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投降，现役军人出任首相比比皆是。1900年竟然规定内阁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即使文官出任首相，军队也可以用拒绝派出陆军相、海军相的手段，使内阁无法成立，从而操纵政权。

加上军队少壮派沾染极端思潮，制度缺陷被他们一再扩大，破坏本已残缺不全的民主制度，推动日本一步步军国主义化，牵引日本疯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肇端是1921年陆军大学毕业的四个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官），小畑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冈村宁次少佐，东条英机少佐，奉命去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考察告一段落后，他们到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聚会，缔结了《巴登巴登密约》，要学习德国总体战的经验，力争在日本创建军部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为此不惜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回国后，他们又找了土肥原贤二（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河本大作（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策划者）等人结成“双叶会”。受其影响，1929年，陆军大学其他毕业生山下奉文（乙级战犯）、铃木贞一（甲级战犯）、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等约40人，结成“一夕会”；1930年，桥本欣五郎等人结成“樱会”等组织。这些人和这些组织成了搅动日本政局、发动侵略的邪恶势力。<sup>1</sup>

1920年代，暗杀政治人物和企业家的逆风开始狂吹；从1921年9月至1936年2月，一共发生了11次重大的恐怖活动和军事政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这些年日本经济动荡和不景气。1923年关东大地震损失巨大，物资匮乏，大量入超，通货膨胀，引发了192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接着是卷入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中下层民众生活艰难，“农村的生活可谓一贫如洗……那些生活在东京庶民区的自由劳动者，还有小企业的工人们，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在东北地区，被生活所困的父母狠心把女儿卖到烟花巷”。<sup>2</sup>加上政治腐败层出不穷，一些青年军人冀图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上层中的野心勃勃的人物择机支持，上下结合，天翻地覆！

1930年至1945年的15位首相中，3位遭暗杀；只有5位是文官，其中2位遇刺。

1930年4月22日，美、英、日三国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10月27日在伦敦交换批准书。日本舆论认为，条约规定美、英、日主力舰比率5-5-3，不平等，是日本的奇耻大辱；海军将领更抨击此事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11月14日，青年军人以此为藉口，在东京车站刺杀内阁首相滨口雄幸，滨口腹部中枪，送往医院抢救，辗转病榻9个月后逝世。滨口是一位比较有远见的文官政治家，主张妇女有选举权，改善劳资关系，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这不是日本首相第一次被暗杀。1921年11月4日下午7点多，原敬首相在东京车站前被右翼分子中冈良一暗杀。这是自1885年内阁制建立以来首位被暗杀的现职首相。原敬也是一位颇有建树和深得民心的文官政治家。1920年代，其他政治家或企业家被暗杀的，比比皆是。

1932年5月15日，主张与中国和平谈判解决九一八事变的犬养毅首相（立宪政友会总裁），在一场未遂政变中被“血盟团”的海军军官闯入官邸乱枪射死。他是维护宪政著名的政党领袖。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政党政治逐渐兴起。“一到大正年代，即1912年以后，所谓议会中心政治的基础，方才逐渐巩固”。而犬养毅之死意味着“自1918年原敬内阁以来的日本政党政治，从此也就寿终正寝了。”<sup>3</sup>

1936年2月26日，约20名青年将校，率东京麻布第三联队1400多名士兵发动军事政变。他们以“尊皇讨奸”、“昭和维新”为口号，凌晨五时分别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占领了

<sup>1</sup> 《検証戦争責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sup>2</sup> 同上，第85页。

<sup>3</sup> 高宗武：《日本真相》，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0、141页。

首相府、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重要机构，还控制了《朝日新闻》社。前内阁总理、内务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大藏相高桥是清等人被杀死。叛军认错了人，把首相的表弟杀死；首相冈田启介躲进杂物间侥幸逃生。28日，天皇决定采取强硬方针，海军舰艇云集东京湾，海军陆战队登陆镇压叛乱；至29日叛乱者投降，秩序恢复；政变策划者、法西斯分子北一辉和17名军官等一共19人被处死刑，大批支持政变的皇道派军官被清洗。

接下来的一年多中，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銑十郎两届内阁无法控制局面相继垮台；最终导致出身贵族46岁的近卫文麿公爵出任首相，组成第一届近卫内阁（1937年6月4日—1939年1月4日）。在此期间，从七七事变到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日本犯下侵略罪和南京大屠杀达到顶峰的反人类罪。

近卫文麿的坚定信念是必须“打倒议会主义”，解散各政党，组建“举国政治体制”。1940年7月、8月，各政党相继解散；9月12日组成大政翼赞会，由近卫文麿担任总裁，从中央到基层社区自成系统，组成“举国政治体制”，组织全民支持侵略战争，目标是“依据肇国之精神，建设大东亚之新秩序，进而确立世界之新秩序。”<sup>1</sup>这种体制是向德国学来的，“陆军也对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满怀期望，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在于纳粹的一党独裁体制，日本也需要实行纳粹那样的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sup>2</sup>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做了三件震动各方的大事：一是9月23日，占领法属越南，开启了日军进军东南亚的态势。二是9月27日，打破德国、日本谈判70多次不能达成协议的局面，迅速签订了《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决心东西呼应，各自实现预定目标。三是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订立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消除了后顾之忧，为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创造了良好条件。日德联手全面挑起世界大战的布局由是完成。

为迫使外相松冈洋右下台，1941年7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7月18日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9月3日，日本战时最高领导机关大本营决定，如果至10月上旬，外交谈判达不到目的，不惜立即与美、英、荷开战，挑起太平洋战争。近卫认为与美、英、荷开战的条件不成熟，1941年10月16日决定内阁总辞职，主动下台；但在后来的内阁中近卫仍任国务大臣，继续参与侵略活动。他的继任者东条英机中将（1941年0月18日—1944年7月22日任首相）终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人，把日本塑造成军国主义国家。它与法西斯或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许多人把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党混同，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此处从俗），德国的共同点是：1，以生存空间不足为藉口，侵略他国；2，消灭政党政治，实行一国一党制，神化最高领袖；3，统制经济，但保留私有制，并且与大财团合作；4，侵犯公民自由，监视公民的一举一动。但两者也有区别：1. 纳粹德国把一部分公民（族群）——犹太人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肆意屠杀；日军暴行罄竹难书，但没有确定哪一民族或阶级是必须消灭的敌人。2. 纳粹标榜社会主义，推行社会福利；而日本没有类似措施。所以，按照严肃的学术规范，把日本称为法西斯国家并不合适。

#### 四、师承德国，把捍卫“国家利益线”和建立“大陆国家日本”和日本领导下的东亚确立为国策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保卫本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责任。可是，19世纪的德国，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除了本土主权，把东欧划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线”，公然把对外侵略定为国策。山县有朋赴欧洲考察后，师承德国，也推动日本政府提出捍卫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首先把韩国列为日本的利益线，后来又逐步扩大所谓利益线范围，把中国

<sup>1</sup> 高宗武：《日本真相》，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sup>2</sup> 《検証戦争責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75—176页。

领土的一部分——满蒙划归其利益线范围，为侵略张目。后来的领导人更冀图把韩国、满蒙变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让日本成为大陆国家。

1925年4月，田中义一大将转入预备役，出任日本重要政党政友会总裁。1927年4月20日，田中出任首相兼外相，组成政友会内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

恰逢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国民革命军制造的南京事件。“上午9时，道入南京之江右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均共产党员)，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学校、医院，驻南京英领事吉雨斯(Herbert A. Giles)受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 美人)，震旦大学预科校长(义人)及法侨一人、英侨二人及日侨一人等遇害。据各方消息，行劫者以第六军人数为多，‘抢劫后鸣笛召集归队’，状似有组织之行为，遂被疑为共产党人企图制造事变，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直接冲突。下午三时半，下关英美军舰即向城内开炮数十发，死伤中国官兵平民三十余人，外人均登舰赴沪，是为南京事件。”<sup>1</sup>这个综述，大致说明了事件的经过，但把此事归罪于共产党却根据不足。这两个军军纪败坏，仇外，杀人越货，领导人当然应该负责。不过，李富春、林祖涵虽是共产党员，但没有发现他们参与此事的任何事实。要说追究领导责任的话，两人均是军的副党代表，第二、第六军的党代表和军长才是首要负责人。

事后，美、英、日使领馆对北伐军都深怀戒心。美国的预案是局势危急时撤侨；英国的部署是增兵守卫上海公共租界；他们都支持日本出兵华北护侨。4月，宁、汉政府分别决定继续北伐。5月28日，天皇以护侨为藉口批准派兵2000进入山东青岛，当年8月30日，日本政府决定撤兵。随着北伐军北上，1928年4月19日，田中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第二次出兵山东的决议，日军约在28日到达济南。5月3日上午9时中日军队发生冲突，12个日本平民遇害。日军包围和攻击北伐军山东交涉署，该署18名工作人员中，除一名勤务兵逃脱外，其余17人全部遇难；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俘后被割舌、割鼻、挖眼，壮烈殉国，史称“五三惨案”。5月4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由关东军派遣一个旅团增援在济日军，第三次出兵山东，9日开始进攻济南，11日完全占领了该城，约1000中国士兵被俘。《东方杂志》报道，“教会调查，中国兵民在济南为日兵所杀者数在二千人以外，受伤者亦有二千余人”。日本还提出“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旁二十华里以内，禁止驻屯中国军队”等为撤军条件，冀图重新攫取中国好不容易在华盛顿九国会议上收回的主权。<sup>2</sup>

与此同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召集陆海军首脑和有关的政府部门首脑开“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政策，制订了《关于东方会议〈对支政策纲领〉田中外相训令》。明目张胆提出：“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将不得不对支那本土与满蒙区别对待，”“鉴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我国国防以及国民的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不仅仅要特殊对待，而且要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使其成为安住之地，这是身为接壤邻邦不得不深切感到的责任。”<sup>3</sup>这一纲领的核心是吞并中国的领土满蒙，此后，日本对华政策就是按照这个纲领进行和进一步发展的。

至于流行多年的所谓灭亡中国的1927年的《田中奏折》，经过海内外学者多年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伪造的文件：1. 这个轰动一时的所谓奏折，用语与格式都与日本的奏折不合。2. 日本皇宫的文献保持非常完整，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反复查找，根本没有这个奏折。天皇和宫内的官员也不知道有这个奏折。3. 坊间流传的所谓取得这个奏折的过程，在防卫森严的皇宫中不可能发生，却像离奇的小说。

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德国对欧洲的

<sup>1</sup>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台北：“国史馆”，第42页。

<sup>2</sup>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第93、92页。

<sup>3</sup> [日] 瀨藤后：《田中义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88—389页。

领导地位，德国承认日本对大东亚的领导地位。天皇为这一条约发表的诏书说：“弘扬大义于八紘，缔造神舆为一宇，实为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兹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而在偷袭珍珠港那一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递交的声明中也明确指出“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sup>1</sup>

所谓八紘一宇，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天下一家，高踞顶端的是日本；“万邦各得其所”就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顺从日本的领导，为日本提供原料、燃料和市场。这是日本独特的国际观。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不惜步步扩大侵华战争，不顾一切挑起太平洋战争。

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始终不变的国策。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一个奇怪的提案，要求会议讨论而未被理睬：人种平等。这是同1918年8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随后得到英、法赞同的十四点原则的核心：“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背道而驰的。威尔逊追求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大小国家独立、平等；而日本所谓人种平等则以它是黄种人的领导者自居，其他东亚国家都要臣服于它，通通由它代表。

巴黎和会上的一大分歧，是中国要从战败国德国手中直接收回胶州湾（青岛）和山东其他地方的主权；而日本则坚持它要继承德国的权益，然后通过中日直接交涉，由它把这些权益转交给中国，以示它是东亚的领导国。1921年—1922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最终就是用这种方式解决了山东问题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结束的14年中日战争，日方的三大追求是：1. 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满蒙），实际是把中国这块领土割离，交给它统治。2. 中、日、满经济提携。3. 共同反共。而中国则要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因而无法妥协，抗战到底。东南亚其他国家（越南、泰国、缅甸、印尼、马来亚等）的民族领袖，在日本反对白人统治口号蛊惑下，在二战期间都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愿意同日本合作，首先解决同殖民国家的矛盾，建立同日本合作的政权，其实是把国家变为日军刺刀下的殖民地。日本战败后他们纷纷宣布国家独立，成为这些国家真正独立的领袖。

以上四条，说到底日本以从古代中国学到的华夏与蛮夷关系为信念和国家政策，以儒家忠孝为本的道德枷锁把国民训练为顺民，于是，疯狂地对外侵略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炼成的。

痛定思痛，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都应冷静、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以现代文明的核心——公民自由和平等为照妖镜，勇敢地抛弃传统中与其扞格不入的观念和制度，保障公民自由，推动国家全面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对内剥夺公民自由，对外堕落为穷凶极恶的侵略者！20世纪以降的世界，自由、民主导致和平，专制、极权走向侵略。创钜痛深，牢记历史教训，前车可鉴，勿蹈覆辙！

<sup>1</sup>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0—51页。